



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协同模式与变革路径

王江曼

(南京工业大学学生事务部, 南京 211816)

摘要: 高校作为高考改革的利益主体之一,与高中、考生、政府存在共同的利益结合点。高校与各主体之间的多元利益格局对于高考改革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从高校视角出发,以利益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探讨了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思想逻辑和实践价值;基于高校与高中、考生和政府等主体的内在关联和利益诉求,构建了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协同模式;高校招生部门与高中、考生、政府以及高校内部各职能部门、学院积极加强双高协同、校生协同、政校协同和内部协同,打通教、考、招、培各环节的闭环。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变革路径,通过加强理念、体制、机制方面的变革,实现各主体间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 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协同;变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8-0459-07

Collaborative pattern and change path for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WANG Jiangman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nterest subject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universities have common points of interest with high schools, candidat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pattern of multiple interest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other subject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ies, guided by the idea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for university enrollment.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interests of universities, high schools, candidat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collaborative patter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for university enrollment is constructed.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department should actively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high school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candidat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and between high schools, candidates, governments, internal departments and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get through close loops in all aspects of teaching, examination,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orm path for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which can maximize common interests by strengthening changes in ideas, systems, and mechanisms.

Key words: university enrollment;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collaborative; change; path

收稿日期:2020-02-08 网络出版日期:2020-04-23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高教重点课题(B-a/2016/01/11);江苏省教育考试招生研究课题(K-e/2018/20);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研究课题(SZ20190348)

作者简介:王江曼(1987—),女,江苏南京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校招生方面的研究。

从我国高考制度的运行实践来看,高考制度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制定,地方政府和高校实施,高中和考生共同参与的。政府、高校、高中和考生作为高考制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动机、目标、方式、诉求以及权力地位存在差异,在利益分配场域内反复进行利益博弈。高考制度的演变,实质上就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博弈或行为协作的过程^[1]。当下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赋予了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引发了积极变革,招生工作日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前段延伸,招生能力成为高校特色发展的先导性条件^[2]。高校作为高考改革的利益主体之一,是联结高中、考生、政府等主体的关键要素,如何与其他主体之间进行博弈或是协作,对于高校招生工作、高考改革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不少学者围绕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已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王龙^[3]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出发,运用“利益-制度”逻辑,在研究高考制度演进变化过程中,发现政府、高校、高中、考生作为高考制度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彼此之间利益格局不断调整,这些变化与高考制度的演进交织互动,推动了高考制度的时代变迁。刘涛^[4]分析了政府、高校、高中、考生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高考改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具体利益诉求,通过明晰诉求以及各主体的自利性,厘清了彼此之间相互冲突又制约的关系。朱国华等^[5]以浙江省高考改革试点为例,指出改革试点方案中存在多元利益主体的趋利性抉择及其价值诉求的割裂,并站在教育主管部门角度,认为制度设计者应当协同多元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冯用军等^[6]提出了高考改革利益共同体的概念,认为高中教师、家长和考生是高考改革最直接的利益共同体,其教育选择态度是影响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高考改革应当协调好以上利益关联方的关系。翁秋怡等^[7]以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为背景,指出高校和高中是共同利益的联盟,应当在文化、招生、课程和资源等方面开展合作衔接,围绕人才培养进行有效的双向协作融合。综观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已经对高考制度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构建利益联盟的概念;但鲜有以高校为切入点,对构建招生利益共同体进行全面的剖析。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背景下,高校作为改革的重要参与主体,与政府、高中、考生等主体之间的联结日益紧密,利益高度交融,高校的工作成效对于其他主体以及高考改革具

有重要影响。以高校为中心构建招生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梳理其与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脉络,发挥高校的中心功能,扩大利益共同体相关方之间协同互动的整体效应。基于此,本文从利益共同体的视角,构建高校招生部门与相关利益主体实现多元互补的协同模式,并提出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变革路径,以期高校等利益主体有效应对高考改革挑战,实现高考改革和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思想逻辑和实践价值

在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之前,首先需要厘清其深层思想逻辑,并进行实践价值分析,这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思想逻辑

马克思对于利益、共同体都有系统的阐述,而“利益共同体”这一思想散见于其著作当中,未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在论证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试图在个人与整体、利益争夺与社会和谐的张力中寻求社会和谐之境。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著作中的“利益共同体”思想,可以将其定义为:由不同的个人或组织以利益为核心内容,以共同体为组成形式,基于共同利益并以全人类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为终极指向的利益一致、结构稳定、不断发展的联合体^[8]。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4年提出,我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需要全方位地同周边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要求内部各主体在某一体系中以共同利益作为价值标准,是目标也是实践过程^[9]。

根据以上“利益共同体”的内涵,就高校招生而言,政府、高中、考生与高校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利益汇合点:高考改革顺利推进是政府动因,激励高校有效发挥招生自主权,探索招收符合培养目标的人才的新途径,实现人才选拔科学性、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均衡;获得资源供给支持是高中动因,在追求升学率、向高校输送优质生源的过程中,高中需要高校提供课程、师资和平台等方面的有益扶持,推动高中教育教学走向“全面而有个性”;享受优质高等教育是考生动因,考生对高校专业内涵、发展前景等情况了解不足,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对专业信息、高校实力以及自身职业生涯规划都存在迫切的指导需求,需要通过高校的提前介入指导,促进考生选择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机会;选拔录取优质

生源是高校动因,通过科学化、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招收到适合的优质生源,保证学生进入适合的专业获得全面发展,高校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过程有赖于与上述各主体以及高校内部相关要素的协同合作,在协同合作中回应相关主体内在目标需求,促进形成多主体共赢的良好局面。

(二)实践价值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背景下,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

1.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内生性要求

多元智力理论指出,人类的智力包括语言、逻辑-数理、空间、运动、音乐、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八个范畴,是多元并发展的,不同个体拥有相对独立的多种智力,再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理论启示人们,教育应当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优势智力领域,通过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拔和培养,使学生个体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6月公布《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考核;同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高校要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和学业生涯规划,以上政策文件的规定都指向人才培养要求多元化、个性化的本源和规律。因此,打通高校与政府、高中、考生之间的闭环,加强高校与各主体的贯通融合,有利于促进高校改变以学生的分数作为单一评价标准,加强信息互通、监管互动、资源共享,最终实现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

2.满足高考改革实践的外铄性导向

每一次高考改革都是政府、高校、高中和考生之间利益博弈和行为协作的结果,推动高考制度由统一性转变为多样化,由中央高度集权转变为地方分权。博弈论认为,一种制度安排需要达到纳什均衡状态才能发生效力,否则该制度安排不能成立。当下新一轮高考改革中,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够规范、高中教学质量不高、高校招生录取不够科学等困境凸显,而强制性的政策制度安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客观存在的多方矛盾。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应当用全面联系的发展眼光加强共同关注、共同合作,高考改革复杂系统涉及的利益主体需要关注、接受并反馈彼此对高考改革内容、考试实施、录取机制等方面的现实反应,通过形成改革的合力来化解改革面临的困境。因此,从高考改革的实践导向来看,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是应有之义。

3.切合立德树人任务的根本性要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2020年1月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提出了“一核”“四层”“四翼”三部分内容组成的高考评价体系,其中“一核”为核心功能,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10]。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高校建设各环节,招生工作承担着人才评价、选拔的重要使命,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和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应当将高校与国家的选才需求、素质教育育人目标相联通,实现“教”“考”“招”“培”全流程各个环节无缝衔接、良性互动。

二、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协同模式

“协同”一词来自古希腊语,原意为共同工作。1971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协同的概念,意在研究集体行为,认为人们的那些似乎是相互约定的行动,做出决定的并非是好意或恶意,而是集体形成的条件^[11]。协同理论是指结合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以系统总体演进目标为期望,各子系统或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协作、支持,形成良性循环态势,促进系统协调运转,产生协同效应。该理论侧重强调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各部门具有相似地位并且不可替代,存在相互依存、协调的内在紧密联系,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协作、关联运动,促进出现新的结构和功能^[12]。

当下高校招生的核心任务是招收到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优质生源,招生要求对高中教学具有导向作用,招生成效是高校人才培养乃至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基础。这在客观上要求加强教、考、招、培几个环节的协同联动,打通人才输送、选拔、培养全过程链条。高校招生部门应当主动基于和各相关主体内在关联,与高中在“教”的环节进行协同,提供课程活动支持,实现教学目标联动,建立以人才培养而非高考分数为核心的有效衔接;与考生在“考”的环节进行协同,通过指导选科、精准宣传,帮助考生科学选科、了解高校,提高生源与高校、专业的匹配性和适切性;与政府在“招”的环节进行协同,争取政府资源和政策支持,优化调整招生专业和政策,促进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有效提升;与高校内部的各部门、学

院在“培”的环节进行协同,加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建设,并落实学院专家教授在确定选才目标要求方面的话语权,实现全过程开展人才培养。以上

分析了涵盖教、考、招、培各环节的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协同模式,利益共同体协同模式示意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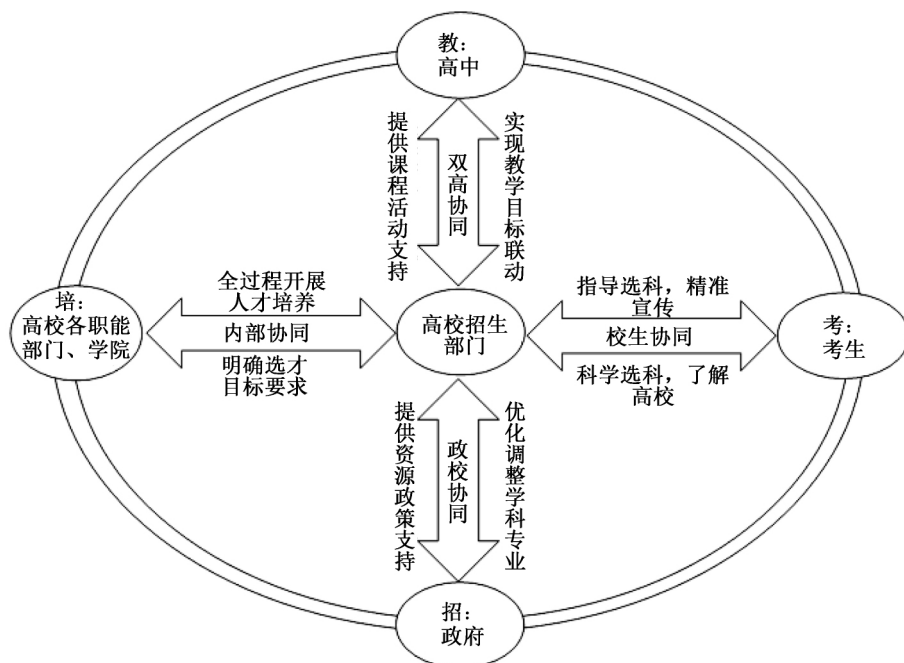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协同模式示意图

(一)双高协同:选育结合,加强与高中衔接贯通

高校和高中有着共同的人才培养诉求,承担了人才培养不同阶段的任务,两者相结合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生源的质量取决于高中教育质量,高校选才要求对高中教学发挥着指挥棒作用。高校招生作为连接高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纽带,需要兼顾两者的利益诉求,通过建立与高中的密切衔接和贯通,促进选育结合,实现选才目标。

一方面以课程为核心,开展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AP)。AP 是美国高校招生的重要参考标准,高中有潜力的学生可以选修大学承认学分的 AP,有利于保证学生的兴趣所在,又为学生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方向,例如新泽西州最古老的私立高中罗格斯中学就有 20 门 AP。我国自 2015 年起,由教育部有关部门、19 所大学以及近 30 所高中共同发起,中国慕课大学先修课理事会基于学堂在线平台开展教学工作,旨在为高中生提供多样化课程和大学学习基础,为高校人才选拔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对学生的志趣、能力和学习过程的评价。高校应当逐步尝试推广 AP,开发系统化、特色化、精品化的课程,加强与高中教育的提前衔接,帮助学生提前学到大学的学习思维、方式和内容,有利于招收合适的生源。

另一方面以活动为载体,加强高校与相关方合作。高校通过在高中建立“学科基地”,加大资源扶持力度,发挥学校优势学科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建立“优秀生源基地”,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人才培养规律、协同育人模式;依托共建基地,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形式多样的活动,“走出去”包括举办教授专场报告、文艺汇演、科创成果展示等,“请进来”包括组织高中校长论坛、班主任座谈会、校园开放日、夏令营或冬令营等。通过常态化的互动合作,促进高校与高中的衔接贯通。

(二)校生协同:精准宣传,增进为考生指导服务

新高考招生方案下,高校录取专业与选考科目挂钩,考生在了解高校综合实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了解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实力水平和发展前景等,还要对自身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高校为了招收符合专业培养要求的生源,需加强对考生的指导服务。

一方面,高校需要突出专业导向,通过专业解读指导考生选科。启发学生自我认知,做好自身兴趣和“唯分数”倾向的平衡,在非功利前提下制定学业和职业生涯规划,不仅是高中的任务,作为人才引进方和接收方的高校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建立常态化生涯规划教育体系^[13]。高校可梳理编印《高中生生涯规划指导手册》进行线下发放和线上发布,

同时走进高中开展讲座培训,指导学生关注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如何结合大学专业实力和自身兴趣特长选择大学专业,并详细介绍学校的学科专业,包括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专业实力、发展前景等,明确各专业对学生的学科素养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帮助学生在全面掌握相关信息的前提下,科学选择选考科目,促进自身长远发展。此外,邀请专家学者解读专业内涵,并利用专业知识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切问题,对包括考生在内的公众发出专家之声,帮助考生从更加宏观的视角了解专业、选择专业,从而确定选考科目。

另一方面,高校需要创新宣传形式,提供多元便捷的宣传咨询服务。通过调研了解掌握考生的宣传咨询服务需求,以此为导向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元的宣传咨询活动。一是广泛运用传统媒介,制作精美的平面宣传材料,包括招生画册、海报、折页以及招生宣传纪念品,在招生考试报发布招生政策信息,在杂志报刊投放招生宣传广告;二是不断创新网络媒介,加强对本科招生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建设,提升电话咨询覆盖范围和服务水平,依托宣传媒体开展多渠道、立体式、精准化宣传;三是充分挖掘人际媒介,除了利用校内宣传人员外,要借助学校在各地的校友会资源,在省内外广泛设立招生咨询服务联络处,方便各地的考生家长及时获得招生咨询服务。

(三)政校协同:互联互通,优化调整专业和政策

新一轮高考改革明确指向高校加强学科专业内涵建设,招生专业目录是否“靓丽”对高校招生工作成效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高校招生政策与生源选拔流程、质量息息相关,要在享有自主权的范围内充分体现学校人才培养要求和综合评价导向。高校需要和政府部门保持互联互通,争取资源和政策支持,共同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

高校专业调整机制本质上是专业调整主体与专业需求主体之间,通过专业需求信息传递执行、专业办学资源配置和适应性评估与持续改进等环节进行的专业调整行为^[14]。在加强政校协同过程中,首先,高校要密切结合政府释放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导向,通过多元维度明确专业需求信息。其次,配置专业办学资源包括扬长项、去库存和调结构:争取政府提供的资源扶持,例如联合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做大做强专业需求较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对政府和社会支持度、认可度不高的专业可以考虑退出;通过大类招生调整专业结构,实现学生自主选择

专业,同时要整合学校和政府资源,积极增设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最后,在评估反馈专业的适应性环节,除了高校内部进行多维度的数据跟踪分析,政府要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评估,如辽宁省教育厅自2012年启动“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利用信息技术动态采集、分析数据,实现专家不进校便能实施评价,探索管办评分离。

构建以综合评价为导向的多元招生政策体系是高校充分发挥招生自主权,实现高考改革之推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根本目的的有效途径。新高考改革要求高校明确“要招什么样的学生”以及“如何招到合适的学生”,生源定位需要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招收方式则涉及到招生政策的制定。高校应以综合评价为突破点,积极争取自主选拔资格并扩大招生计划规模。自2003年至2019年,全国已有90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自2007年起,顶尖高校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逐步推进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2020年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强基计划”),在3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试点,同时自主招生全面取消,标志着高校多元考核评价模式不断完善。有条件的高校应当积极顺应发展趋势,开展自主选拔,基于学校生源定位和高考改革导向,科学设计招生政策。针对如何利用考生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上级招生主管部门统一政策规定下提升招生政策运行成效等问题,高校和相关主管部门需加强沟通协调,促进高校招生自主权有效落实,确保招生政策符合公平性、与社会宏观环境制度的同构性和人才培养内在逻辑性的要求^[15]。

(四)内部协同:三方联动,全过程开展人才培养

招生、培养和就业是高校办学育人的完整链条,高校招生作为人才培养的前端延伸,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和就业质量具有直接影响,而人才培养和就业质量反过来又是影响招生工作的重要因素。高校应当构建招生、培养、就业三方协同联动的机制,通过加强全过程人才培养,为招生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招生、培养、就业协同联动机制的核心是加强专业建设,2017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推动高校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动态适应机制,提高专业建设质量”。在具体实践层面,高校可根据一志愿报考率、调剂率、大类分流选择率、就业率等指标,通过招生、培养和就业多元维度构建专业评价体系,对专业进行排名和预警,制定专业建设与调整规划,建立盘活

专业存量、有进有出的专业增减机制,构建与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专业体系,有效发挥专业作为人才培养基本单元和立校之本的实际效用,为高校按专业招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优化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高校招生部门在行使行政权力开展招生工作的同时,需要充分发挥院系教授、专家的学术权力,增强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的关联性。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校招生部门在确定专业录取标准,即选考科目要求时,一方面要基于国家对于各专业选考科目的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要和作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基本单位的院系保持有效沟通,落实院系学科专家在制定各自学科专业选考科目的自主权,提高人才选拔目标与实际培养效果的契合度和达成度。

三、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变革路径

通过以上协同模式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同时,还需要以招生工作为核心,经历理念、体制、机制的变革,提供实现共同利益的基本路径。

(一)理念的变革:厚植利益因子,形成共同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是教育根本任务”的论断,是对教育本源的回归和匡正,包含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个性心理品质培养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16]。“立德树人”强调的“立”和“树”,并非简单地通过灌输和考试等教育手段实现,而是需要依靠社会氛围的全方位浸染与熏陶。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不仅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推进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践过程,这理应是各主体的共同利益和意愿。高校招生部门要将立德树人贯穿到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的全过程,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加强与相关主体的协同合作,在各项工作中渗透、传递立德树人的思想,形成高校、高中、考生、政府四维一体共同作用的合力体系,弥补单纯以考分高低作为人才选拔标准的缺陷,促进从“招分”到“招人”的转变,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体制的变革:加强建设投入,提升招生水平

高考改革新形势下,高校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凸显,需主动建设专业化的招生力,充分发挥选拔优质匹配生源的招生自主权和内生性动力,以专业的招生组织水平促进利益共同体效用最大化。第一,专业的招生队伍是前提,招生队伍由招办人员、招生宣传联络员和招生志愿者组成:招办人员负责招生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服务;招生宣传联络员来自全校范围内的教职工,由他们负责高中母校或家乡地区的

招生宣传工作;招生志愿者为在校学生,负责校园导览、宣传大学学习与文化生活等。各类招生人员需参加业务培训,掌握学校校情、招生政策并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第二,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关键。高校可尝试建立招生指导委员会制度,由校领导负责、学科专家为主组成专门的委员会,有效均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共同制定和调整招生政策,并评估招生结果,以确保招生政策有效执行。同时,加强招生工作物质奖励和政策奖励,例如将招生宣传与职称、职务晋升关联起来,促进教职工积极主动有效地参与招生工作。第三,充足的资源投入是保障。加强经费支持,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是确保各项工作事半功倍的重要保障。

(三)机制的变革:规范招生秩序,公平公正招生

招生利益共同体的有效运行除了需要理念、体制的变革之外,还需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工作机制。一方面,高校要紧抓制度执行,营造公平公正的招生环境,在拟定招生方案和标准的过程中,尽量争取相关主体的理解和支持,针对可能影响潜在生源报考选择的对象群体,例如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高中校长、高三年级教师及家长等,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等工作,以提高政策的理解和接受度^[2],坚持招生全程透明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招生政策和招生程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为高校招生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暗藏潜在的安全风险,高校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录取平台的测试、模拟,逐项研判各环节工作要点,排除风险隐患,严防考生数据信息泄露,确保各项招生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四、结 语

新一轮高考改革涉及的改革考试科目设置、按专业投档、建立多元录取机制等内容,为高校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增强了内在联系和合作基础,同时也给高校带来生源市场定位、招生宣传竞争、学科内涵提升等挑战冲击,在客观上激发了高校寻求外部协作力量的内生动力。结合当下高考改革政策,以高校招生部门为核心,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具有逻辑自洽性和实践价值性。高校招生部门可通过与高中、考生、政府以及高校内部各职能部门、学院构建多管齐下的协同模式,在理念、体制、机制方面进行积极主动的变革,通过构建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从而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工作体系,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考改革顺利实施,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和相关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多元格局也会随之变化,高校招生利益共同体如何保持良性运行、有效发挥作用,有待持续关注利益共同体内外部变化,进一步开展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 [1] 张应强,李峻.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高考制度改革: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0(1):82-87.
- [2] 董秀华,王薇,王歆妙.新高考改革:高校招生面临的挑战与变革[J].复旦教育论坛,2018,16(3):43-50.
- [3] 王龙.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中国高考制度的演进[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26-28.
- [4] 刘涛.高考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与启示[J].考试研究,2013,9(4):17-21.
- [5] 朱国华,吴兆雪.浙江高考改革试点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趋利性抉择及完善策略[J].教育探索,2018(5):33-41.
- [6] 冯用军.高考改革利益共同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分析:基于云南省高三师生及家长的调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2):48-52.
- [7] 翁秋怡,张男星.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高校的机遇与挑战:访第二届高校高中教育发展论坛与会专家[J].大学(研究版),2018(2):4-23.
- [8] 王言文.马克思利益共同体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D].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11:13-17.
- [9] 宫秀川,王琛.利益共同体的界定与分析[J].中国国情国力,2017(7):56-59.
- [10] 中国教育网.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人就《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答记者问[EB/OL].(2020-01-08)[2020-01-13]. <http://www.neea.edu.cn/html1/report/2001/8988-1.htm>.
- [11] 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戴鸣钟,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234.
- [12] 白列湖.协同论与管理协同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07(5):228-230.
- [13] 胡金波.顺应改革趋势 符合江苏实际 遵循教育规律 促进人才培养[J].江苏高教,2019(6):8-11.
- [14] 王晓玲,张德祥.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专业调整机制的演变:高校专业调整70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2019(6):33-39.
- [15] 李峻.高考政策:从“国家主义”到“利益相关者”: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演变路径[J].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汇编,2008(11):533-541.
- [16] 谢安国.习近平立德树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8):9-14.

(责任编辑:陈丽琼)